



中共佛山市委党校特约

以公园场景化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活力

□李丽华

城市公共空间是指城市空间中一切非限于特定人群使用的城市空间。包括交通空间、生活行为空间、供应和处理空间、环境要素空间;简单来讲,是指能够提供公众进行一定社会活动的公共空间。主要包括街道、广场、公园、绿地、山川、水面等。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对生活和工作环境品质提出更高要求,城市公共空间俨然成为衡量城市生活品质提升与否的重要标志。公园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它公共空间不同,公园既不是单一的硬质空间与社会空间如街道、广场,也不是单一的柔质空间与自然空间如绿地、水面,它是硬质空间与柔质空间的结合体,是自然空间向社会空间转化与延伸,是自然、人、城市共生共存的缩影。2021年底,南海区桂城街道荣获“202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公园城市典范”,笔者通过调研,认为其本质是通过公园场景化来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品质与活力。

通俗来讲,公园场景化是以场景化模式来建设或改造公园,也就是场景

要素在公园中的呈现,来吸引人们前来公园集聚、交往、交换。而人在公共场所的聚集和交往正是城市的实质和魅力所在,也是城市活力的体现。场景包括五大要素:基础设施、社区、文化活动、多样化人群和价值理念。这些要素如何在公园中呈现?

首先是确定公园建设理念。打造公园城市时,桂城提出了“在城市游山玩水,在公园工作生活”的建设理念和愿景。在此理念指导下,各个公园有各自的主题导向,兼具共性与差异性。一般来说,公园主要有两类:综合类公园和主题类公园。桂城的综合类公园主要有千灯湖公园、滨江公园、文翰湖公园、映月湖公园等,是群众休憩、游玩、娱乐的综合性公共空间。大大小小主题各异的公园有很多,如主题为科技类的AI公园、智慧公园等;体育类的南海体育公园、千灯湖体育公园等;“体育+科技”类的WePark足球公园、BNS篮球公园;潮玩类的极限公园等,不同的主题吸引着不同价值需求的人群前来。

其次是完善公园基础设施。这些设

施既包括公园自有的基础设施,也包括到达公园的基础设施。公园自有的基础设施,综合类公园和主题类公园各有侧重,均颇为完善。例如滨江公园,除了一应俱全的儿童游乐设施,康体设施,可以一路畅玩,还配备了读书驿站,自助沐浴房,无人售卖一体功能的网红驿站等,满足群众休闲游乐时的各类需求。同时,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注入传统岭南广府文化要素,如醒狮、剪纸等,使公园的视觉观感既传统优雅又现代时尚。公共空间亦强调可达性和便利性,应有利于群众的使用。桂城路网中的轨道、公交、非机动车、慢行系统的结合,可让群众出行与公园无缝对接。

第三是充实公园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是公共空间活起来的重要载体,是公园吸引力源头之一。公园里主题不一、种类各异的文化活动提升城市文化活力。如在千灯湖公园连续举办了两届公共艺术展,“当燃2021”的线上千灯湖音乐节、“灯光龙狮闹元宵”等文化活动,集传统、现代、时尚、年轻、潮流、环保、科技等元素于一体,展示了价值多元的城市文化。

第四是吸引多样化人群。公共空间是自我与陌生的“他者”相遇的场所。每一位空间的利用者都是差异的群众个体,差异会带来矛盾、冲突与交换(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从而产生新的实践形式和意义。可以说,公共空间的核心是建立在差异和交换之上的公共生活。所以,公园接纳人群的无差别化和公共性导向了进入群体的多样性,同时,文化活动的多样性也吸引着多样化的人群进入公园。

最后是每个公园都存在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它必然与周边的社区产生各种各样的关联,在公园的建设和打造过程中,社区影响着公园的最初形态和设计定位及成长,公园又形塑周边社区居民的休闲娱乐等日常生活方式。

当公园场景形成,这个微型场景蕴含着城市丰富的文化要素,展示出城市的文化风貌,通过公园活动的沉浸式体验,吸引多样化人群前来,提升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活力,也形塑了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

(作者系中共佛山市委党校科研处副主任)

打造知识产权助力佛山科创企业发展新模式

□高梦捷

生活中充满了知识产权,尤其在商业竞争上。生活中的发明、物品的外观设计、文学和艺术作品,商业中的标志、名称、图像都可被认为是某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专有权利。为了更好地保护产权人的利益,知识产权制度也应运而生,并不断完善。

科创企业一直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是当下中国创新源泉和重要增长动力。科创企业,一般是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其涵盖的企业类型有网络信息科技、电子科技、生产技术、医药研发、新能源等。资本市场的科创板,正是为这些希望在主板上市,又受条件所限,不愿低估值发行和牺牲灵活股权制度的企业设立的融资板块。“专利”已成为科创企业重要的核心资产和竞争力,及早做好技术保护和专利布局,是每个科创企业的必要战略。

科创企业建立专利保护体系不仅意味着专利申请,还可以了解来自国内外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情况,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保证企业直面市场

的经营能力;企业还可以规划专利系统结构,以降低产品的技术迭代风险;增强对创新团队的建设与管理,因为这涉及企业的技术研发的知识产权管理和知识产权来源,特别是技术保密和商业秘密的管理和技术权利归属管理,这决定了该企业对技术的拥有和控制。科创企业具有较高的科技研发创新能力,而知识产权管理是保障科技创新能力与利益的重要手段,科创企业和希望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应尽早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佛山在2021年成为“科创中国”的试点城市。近年来更是通过全国发明展将佛山雄厚的制造业及科创产业资源,向全国输出和推广,在推动科创发明成功的对接转化和技术交流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接下来,佛山的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精准推出一系列扶持政策,统筹推进知识产权改革措施,为企业搭台,引领佛山科创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增强企业核心

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助推佛山科创企业登陆科创板,打造助力佛山科创企业的新模式。

知识产权代理公司、高校专家和律师事务所等服务专家团队也要在企业需要的专利代理、专利布局、法律服务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培训和咨询服务,在各级政府的扶持下,举办系列公益培训讲座,企业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深化创新与合作,不断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经营能力。

各级政府和服务机构应关注科技型、创新型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支持科创重点项目建设,构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合作框架。由地方政府牵头、知识产权代理布局、高校提供理论指导、联合地方银行和券商机构、交易所提供专利代理、专利布局、法律服务和金融支持,在夯实“科创板”后备资源同时,邀请国内知名券商召开科创板上市推介会,向当地拟登陆科创板的优质科创企业给予甄选、分级、辅导、推荐,以服务、金融、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这种以“政府搭

台+知识产权公司服务+高校理论指导+法律保障+银行、证券助力+科创企业上市”和“政府牵头+银行贷款+企业知识产权质押”的知识产权服务与融资模式,无疑会给佛山的科创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这种助力科创企业的新模式的宗旨就是精准对接地方科创企业,满足他们的专利保护、法律保障的需求,促进企业的高增长和长远发展。地方可以通过构建行业研究库、优选项目库、外部机构合作库、科创产品方案库、专业团队人才库等方面的资源储备,构建全辖区覆盖的完整科创业务服务体系,将专业化、多元化的科创服务覆盖到更广泛行业领域。科创企业也要依托佛山新模式的实施,在政府搭建的平台上,积极与知识产权专利代理公司、高校理论研究、法律事务所及国内各类券商等机构开展合作,尽早登陆科创板,为企业进一步高成长奠定更好的基础。

(作者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构建多元主体的良好环境 推动佛山智慧社区建设

□吴亚慧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智慧社区是沿着信息科技逻辑发展起来的,并应用在以人为服务对象和治理主体的社区场域中。即智慧社区不是纯粹的技术概念,需要突出治理行为与过程的智慧化、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融合、服务供给与需求的高度匹配等。因此,加强对智慧社区建设的主体建构,对提高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佛山市禅城区大力推进智慧化基层治理改革,探索出“1+2+N”智慧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式,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一条“智治+共治”新路径。

一是技术赋权下重建共治结构。在智能社区阶段,技术主要运用在社区管理层面,而智慧社区阶段的大数据系统及终端的普及应用,从技术层面将多元主体纳入社区治理结构,本质上推动基层治理体制转型。“禅城智慧党建·共享社区”平台打造“物业事

项表决”“问卷调查”等板块,以服务资源的共享化实现多元主体多层次多维度关联社区乃至参与治理。

二是技术赋责下理顺共治机制。禅城智慧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理顺了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内在关系与责任边界。在智慧平台上规范化运作党员“三先”机制,压实党员治理责任,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智慧平台把各种组织如业委会、物业管理公司吸纳到治理结构中,在“满意度评价”“公共收益公示”等互动过程实现各主体交互的精准匹配。

三是技术赋能下提升共治能力。社区治理质量很大程度要看参与主体的能力素养。禅城智慧社区打造线上线下两个平台,在提升居民对社区关注度同时强化主人翁角色。比如组建治理监督小组等方式有助于拓展居民参与治理的范围和层次,让“投诉大户”在监督小组的角色担当中转向更柔和有效的参与方式,具备专业背景的热心居

民找到参与社区治理的新途径。

笔者认为,信息技术嵌入社区治理适应了利益诉求多元化复杂化的演变趋势,同时也要落脚于基层治理的“公共性”,必然要考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要为主体性发挥提供良好环境。

第一,优化党组织主体性。理念上,基层党组织必须强化引领社区治理的主责和担当。当前大多通过清单制明确基层党组织的职责任务,仍然要强化其引领基层治理的主体性地位,才能更好捕捉治理“公共性”,更好发挥智慧平台精准服务、共享发展成果的技术优势。此外,在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动员组织能力上,可从党员链接社区居民方面下功夫,要善于管理党员,结合治理需求进行合理划分,包干到人、责任到人。

第二,深化政府主体性。在智慧社区建设中,政府出台政策、制定标准等,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客观地看,政府主体只能提供基础性、一般性服务,

无法满足公共服务精准化要求,各类平台存在较多“僵尸”用户就是直接体现。下一步,政府需在规划引领和标准建设方面对智慧社区进行优化升级,强调现代信息技术的精准运用,提升用户黏性和体验感。充分发挥智慧平台赋权主体性互动的技术优势,在平等、互惠、合作关系建构中做到求同存异,实现分配和共享的合理性与公正性,形成共同享有和共同遵循的社区价值伦理。

第三,强化居民主体性。当前社区居民参与共治的主体性薄弱,大多停留在执行和服从层面,在被反复动员说服的情况下才愿意参与活动。建议利用智慧技术对社区居民赋权增能,同时打造居民交往公共空间,加强居民的互动共建,强化居民的社区认知。同时培育协作性自治组织,便于社区居民在“组织化”互动中发展知识和能力,促进其主体性发挥。

(作者单位:中共佛山市委党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根基”与“命脉”;在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文化根脉的一路同行。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构。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路线、方针、政策,来自实践中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和理论的有意识建构。这种建构作用突出展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两大特征上。

一是“共同富裕”的传统文化建构。追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其理念与实践的成型,都被标记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孔子就已提出了著名的“先富后教”论。他还向统治者提出告诫,“不患寡而患不均”;平等地追求经济利益,就可以臻至“均无贫”的公正状态。《礼记·礼运·大同》所描绘的“天下为公”后来被视为中华民族最高社会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

二是“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建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追求。在中国文化中,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仁者爱人”,孟子甚至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民本精神的光辉论断。中国文化对人性的完善抱持一种非常高的期许和乐观的态度。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形成,显然是对中国传统的以人为本思想的历史性推进。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赋能。全民族巨大潜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蓬勃迸发,从两个层面上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磅礴的动能供应。

爱国主义的全过程赋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最初开启和探索,就源于“冲击—反应”模式下先进的中国人的爱国追求。此后,无论在革命或是建设阶段,爱国主义都构成了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核心激励机制。时至今日,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首先就应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精神谱系的关键节点赋能。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的关键时空节点,中国共产党人总能以惊人的精神力量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因之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施以针对性赋能。这些精神的构成同样深度传承了中国文化的优质基因,如“义以为上”的价值取向、自强不息的奋斗态度、刚正不阿的气节操守、“知行合一”的认识理性等。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体共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新进展,创制出更具时代特色的新内容、新形态。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共生共荣、一体推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两个确立”的重大政治判断,指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融汇了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它既是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理论指南,也理应是学习、弘扬传统文化的璀璨文化宝藏,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作者单位: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建构、赋能与共生

□王彦威